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马 功 成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几次论战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等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通过论战,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论断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一、论战的由来

这次论战是从一九三〇年开始的。其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有它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

在国际方面:托洛茨基派思想的影响,是这次论战发生的思想根源。一九二七年前后,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作过许多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封建压迫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然而,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开始,在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却趁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失败之机,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发起了进攻。托洛茨基派胡说:中国没有封建地主阶

级,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直接统治的地位。”(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因此,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反封建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托洛茨基派的另一头目拉狄克,则把商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一直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拉狄克《中国革命史》)斯大林当时就驳斥了托洛茨基派的谬论,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斯大林全集》第九卷,261页)但事隔几年之后,托洛茨基派的谬论却又被中国的托派拣起来当作反对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国内方面:关于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本来已作了比较明确的解决,大会决议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当前的两大任务”。同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并且找到了以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为主要内容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成为取消主义者，并和国际上的托派搞在一起，贩卖托派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他们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标志“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经“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搞所谓“社会主义”（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给中央的信）。陈独秀被清除出党后，公开与托派分子相勾结，组成托陈取消派。他们采取诡辩论和形而上学的手法，掩盖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实质，企图模糊人们的认识，达到取消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目的。从一九三〇年起，托派分子严灵峰等人连续在《动力》杂志第一、二期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时称他们为“动力派”。以后，严灵峰又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名之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另一个托派分子任曙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一书，系统地宣扬托派观点。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文人陶希圣、顾孟余、周佛海等人（他们在上海办了一个刊物叫《新生命》，因而被称为“新生命派”）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也发表了许多反动观点。

鉴于上述情况，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明确：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之后，中国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揭破托陈取消派和“新生命派”

的进攻，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党组织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成立各种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利用各种合法场合，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〇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主要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宣告成立。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进步刊物《新思潮》、《读书杂志》等为阵地，连续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文章。《新思潮》第五期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了潘东周（曾任李立三同志的秘书）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的《中国土地问题》、李一氓的《中国劳动问题》、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揭开了论战的序幕。

二、论战的主要问题

这次论战是围绕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这三种社会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农村经济性质问题而展开的，中心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一）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上：托派宣扬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的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推动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严灵峰认为：既然“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而资本主义同封建的经济制度又是“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并且还说：“中国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军阀制度，不但帝国主义想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也想利用来扩充自己的利益”，结果“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

力扩大。”严灵峰在这里把帝国主义说成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恩人，把封建军阀制度说成是适合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制度，这显然是有意歪曲历史事实。任曙也极力为严灵峰帮腔，他说，有人认为“帝国主义维护封建残余”，那是“荒谬绝伦”的。

（所引任、严的话，均出自《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书，下同。）

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潘东周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打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则是“帝国主义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向中国整个经济进攻。”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王学文也指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占支配地位。虽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占压倒优势。无论“就地域的面积来说，不过少数大城市和少数地方；就发展的程度来说，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轻工业。”至于托派先生们说中国封建军阀制度也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更是荒唐。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大桎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往往是利用中国的封建军阀势力为其走狗，当“帝国主义因其内部矛盾及其相互间冲突加紧的时候，必然地要反映在中国方面形成军阀的混战”。并且，军阀混战发生，各个军阀又各自依靠其帝国主义主子，“实行其更忠实地投降与服从，来出卖中国经济的权利，尽力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资本。”

（所引潘、王的话均见《中国经济的性质》与《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两文，下同。）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中国的贫困与经济的破产。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而不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在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的关系上：托派鼓吹中国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严灵峰和任曙为要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从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去进行分析研究，而单纯以商品经济为中心，认为封建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帝国主义入侵以来，封建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所以，“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序论中，更进一步夸大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作用，他说：“对外贸易乃是经济问题的中心的中心”，“可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中的性质问题。”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统计数字来骗人，如把“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说成是全国轮船与帆船的百分比，从而断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了优势”。

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托派所谓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在农村与都市，都只是单纯商品的生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在这种商品经济里，我们只能看到前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而且这种商品经济往往“与高利贷资本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剥削方式，“特别与封建的半封建的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关系最为密切”，它是“以压迫那种小商品生产而存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是它们剥削的对象。这种“资本形态在

中国广泛的存在，在都市和农村间演着剥削的主要角色”（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人将高利贷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现象，这真是毫无经济常识的说话。”

（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同时，刘梦云（据王学文和吴黎平回忆就是张闻天同志的笔名）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针对任曙夸大对外贸易的观点指出：“任曙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他认为，商品经济本身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如果把帝国主义的入侵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说成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极端错误的。虽然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是，“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

（三）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托派否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鼓吹华洋资本应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任曙说：“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的好兄弟”，“不应该”给他们“划分界限”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把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与中国民族经济之间的差别，说成象一个国家内大小企业之间的差别一样，把华洋资本之间的竞争，看成就象一个国家内各企业的自由竞争一样，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而把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和特权来扼杀中国国民经济生路的事实掩盖起来。宣扬两种经济都是“中国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国经济”，都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革命的科学社会工作者针对他们所谓

“一视同仁”的谬论指出：“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中国经济中正因为有雄厚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并且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对中国让步”，他们“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民族工业的破产，成了目前普遍全国的现象。”（同上，潘文）如果不信，“请看：中国民族工业如南洋烟草公司，某某纱厂，中国丝绸业，北方火柴业等等，不是都继续地倒闭了么？为什么倒闭？为的是，政治上得不到支持者的保护，经济上要许多苛捐杂税的负担，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民族工业的倒闭，却给帝国主义以发展的时机。当时各个大城市外国资本占绝大多数，而中国的资本主义，除少数官僚资本外，“民族工业实在微乎其微”。加之各个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军阀混战的开始，断绝交通，扣车封船，使民族工业不得不受到重大打击，而同时帝国主义武器的输入继续不绝，内河航运无阻，却得到发展的机会。”（同上，王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因此，托派所谓的“一视同仁”论，是为帝国主义帮腔的。并且他们还故意用“左”的词句指责分别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作用不同的人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而实际上他们却是用自己的论点赞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四）在农村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上：托派歪曲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任曙根据“土地集中”的一些统计数字说：“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严灵峰也说：中国旧式地主已经破产，“占有中国广大土地的，……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或地主化的资本家”，即“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并以诡辩论的手法把中国地租与西欧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混为一谈，说农民“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给地

主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因而他大肆叫嚷：“中国今日的地主们，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式地主”。在这里，他们根本不从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去论究地租的性质，完全否定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对立。

针对托派分子歪曲农村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谬论，刘梦云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农村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少数封建地主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或者没有土地，不得不以租佃方式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关系，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当然，不是说农村生产关系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后，没有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封建势力走向自身的否定”。相反，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着中国的农村。因此，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半封建性质的，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剥削。同时，潘东周也指出：地租就是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中国地租与西欧国家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地租是向农民强取其全部的剩余生产产品以及其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而西欧资本主义的地租是分取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并且是小部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中，是资本家（有时这个资本家兼为地主）雇用农村工人，以资本家的工具、肥料、资本来进行生产，工人得其全部的必需劳动的生产价值（工资），资本家得其全部的剩余价值（利润）。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农民以自己的生产工具、肥料、资本以及劳动所

生产的产品交给地主。“这样的剥削关系，是农奴制之强迫劳动的残余，因此，它是封建关系”，所谓“新式地主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与地主虽有密切联系，“甚至资本家本人就是地主，这是事实”，“但他绝不能改变地租之封建性。我们是从生产关系及剥削形式上去认识某一种经济现象的性质，绝不能就剥削者本人的出身及目的而有所改变”。若是资产阶级也向农民征收这样高的地租，这只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也利用这种封建式的地租以剥夺农民，但仍然不能说地租是资本主义的。“只有毫无社会科学常识的人，才会说出这个地租是资本主义的。”

经过这场激烈的论战，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各个方面彻底驳斥了所谓的“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大可不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荒谬观点。并且尖锐地指出：把目前的中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托派“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此后，托派分子刘镜园（即刘仁静）又发表文章，鼓吹中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标榜自己对论战双方的观点都不尽同意的人，也发表了一些五花八门的看法，如孙绰章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罗敦伟认为中国社会是“变质的封建社会”等。在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批判这些错误观点。

三、论战的意义

这场论战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当时的多数社会科学刊物，都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场论战。党还在一些高等院校组织进步师生，利用讲坛、学术讨论会、墙报等形式参加论战。在论战中虽然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一些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分析和

论述中国社会性质时，还有不够深刻和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它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意义十分重大。

第一，这次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关系到党的纲领、战略策略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根本问题，是发展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这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斗争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用大量的历史事实，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对中国社会经济作了较全面的分析，从各个方面驳斥了托派及国民党一些反动文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论断，戳穿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妄图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本质。特别是通过“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事实，有力地粉碎了托派分子的反动观点，指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

第二，这次论战，是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一次重大实践。他们在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扩大了视野，对中国历史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壮大了革命队伍。同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政治路线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从而教育和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第三，这次论战及其稍后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都是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它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准备了条件。

我院举行庆祝建院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

十一月十一日，是我院建院三十周年纪念日。为庆祝校庆，我院政教、历史、教育（筹）等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分别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各系报告会形式多样，涉及内容广泛。参加报告会的有教授、讲师、助教和学

生，有的系还邀请在成都市工作的部分校友参加，这次校庆学术报告会持续了三天，共宣读和交流了一百一十多篇学术论文。

（王永政）

简讯三则

▲今年三月份以来，我院各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学位条例》，先后对七七、七八两届毕业生的成绩和毕业鉴定进行了逐个审核，对符合“条例”有关规定的毕业生，报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分别授予政教、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六系的一千八百六十八名毕业生以法学学士、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的学位并分别寄发了学位证书。

▲因参加纪念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首次来成都的著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员唐弢同志，应我院中文系邀请，于十一月三日向该系近千名师生作了题为《关于现代文学的一些问题》的学术报告，并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英中了解协会理事德里克·班以安先生和他的夫人英籍华人廖鸿英女士，应聘来我院讲学。班以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在英国国内致力于英中友好活动。这次是在他所率领的英国文化人士访华团来我国各地参观访问结束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到达成都的。根据协议，班以安夫妇将分别为我院外语系二、三年级学生授课十一个月。

（邓奎金）